

談美毛關係

尹慶耀

一

美國不喜歡共產主義，毛共要埋葬資本主義，這是雙方不變的原則。二者接近，只是外交上的策略運用而已。

我們可以假定，維持亞洲的均勢，是美國當前的政策，也可說是美國的傳統政策。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在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的一次聽證會中，前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祕書戴維斯（John Paton Davis Jr.）曾應邀作證，當他提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延安之行時說：

「我極關心一旦蘇聯介入太平洋戰爭那將發生什麼事情，我認為蘇聯極可能參加。我恐怕蘇聯進入太平洋戰爭後將會抓住了中共，我相信中共在某些程度上是離開蘇聯而獨立的……。」

戴維斯的判斷是錯誤的。蘇聯并未介入太平洋戰爭，而毛共政權尚未正式誕生，毛澤東就已宣布向蘇聯「一邊倒」^①。然而，一九四四年當時，在美國，和戴維斯抱同樣見解的，恐怕還大有人在。美國絕不願見蘇聯奄有中國大陸，使它挾持着廣袤的領土、衆多的人口，破壞亞洲的權力均衡，威脅到美國乃至世界的安全。

中、蘇共黨深切瞭解美國人當時的心理狀態，故意表明彼此并無若何關係，而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更利用一切機會醜詆中國政府而美化毛共，把美國政策導上一個錯誤方向。使毛共得以偽裝的姿態，在明處獲得美國的縱容，在暗處獲得蘇聯的協助，席捲了中國大陸。赤色勢力的高漲，破壞了亞洲的均勢，威脅了世界的和平。毛共不僅在韓國戰場與美國直接對壘，且在國產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中，堅主「美帝國主義是全世界反動勢力的中心，人民群眾的最兇惡的敵人」^②。在這種情勢下，美國對於毛共，也就採取了在政治上予以孤立，在經濟上予以封鎖，在軍事上予以圍堵的政策。

進入一九六〇年代，中蘇共黨逐漸由分歧而對立，此事當然給美國人看

在眼裏。一九六二年十月七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刊載艾爾索普（Steward Johnston Oliver Alsop）的文章說：「中蘇爭吵顯然已經達到最後破裂不能避免的地步」，「甘迺迪手下的決策者正在審慎地但是抱有希望地進行工作」，甘迺迪政府「對於蘇聯和西方關係可能已發展到真正重大的轉折點這一問題上是愈來愈興奮了」。這些話是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刊載「不許美帝國主義插手蘇分歧」一文中所引，當然美國所注意的似乎是蘇聯與西方關係的改善，而毛共的態度，則是不願意讓美國對毛蘇分歧加以利用。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人民日報」與「紅旗」雜誌兩個編輯部發表聯合文章「駁蘇共新領導的所謂『聯合行動』」。其時已是毛共策劃的反美反蘇的第二次亞非會議以及印尼政變相繼失敗之後，文中強調毛澤東提出的「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為「新的歷史條件下關於世界革命」的「極為重要的戰略思想」。對於蘇聯，除斥為現代修正主義之外，并聲言毛共與蘇聯「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③。要和蘇聯「劃清界線」。在我們的印象中，美國并不太注意毛共對美國那段話，而更注意毛共對蘇聯那段話。

一九六六年三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遠東暨太平洋區小組委員會，舉行對毛共及亞洲政策聽證會，作證人士中不少主張對毛共「和解」，而對所謂「圍堵」「孤立」則頗有責難。這顯示美國對毛共政策已有轉變跡象，其中關鍵則是毛、蘇鬥爭。

在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的莫斯汀（R. Moorsteen）和艾布維茨（M. Abramowitz）合著「美國對中共政策計劃書（Renaking China Policy）」^④，對於毛蘇糾紛一事，抱有如下觀點：

「這是中共對外所最注意的問題。我們可以利用中共對美蘇聯合對

付它的恐懼；或者在適當時間，設法來減輕中共的憂慮；如果中共和美國的來往有若干進展的話。中共也看到（當然不是很樂觀的）利用美國對付蘇聯的可能。美國自然也可以利用改善對中共的關係，來限制若干蘇聯困擾我們的趨勢④。」

這仍是利用毛蘇矛盾，所不同的是，這一次是想以接近毛共來困擾蘇聯，而減少蘇聯對美國的困擾。只是，從一九六六年起，毛共就進入文革期，在「造反外交」的形勢下，美毛接近就只好展期實施了。

二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毛共舉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次全會的公報中，毛共強調要建立最廣泛的反美「國際統一戰線」，而「蘇聯修正主義領導集團奉行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當然不包括在這個統一戰線之內」。一九六八年十月，毛共舉行八屆十二中全會，這次全會的公報中，毛共號召「一切被美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所壓迫的人民，應當結成一個廣泛的統一戰線」。毛共對外的「三反」路線，已在這次全會中形成，但與此同時，它在對外策略的運用上，業已醞釀變化，而促成此項變化的發酵劑，乃是捷克事件。

在美毛接近途中，一九六八年是第一個值得注意的年頭。就毛共方面言，同年一月八日美毛間第一三四次華沙會談時，原決定下次會談於五月二十日舉行，但毛共於同月十八日通知美方，以其駐華沙「大使」到時候來不及返回任所，及「目前沒有什麼事情可談」為由，又建議把會談延至十一月舉行。八月二十日夜，蘇聯率五國軍隊入捷，壓服了當時捷克的自由化運動。此一事件，使毛共異常震驚，於是想改變一下過去的蠻橫態度，與美國恢復接觸。

就美國方面言，一九六八年是大選年。候選人之一的尼克森，曾於一九六七年十月出版的「外交季刊」上，發表「越戰後的亞洲」一文，主張美國對亞洲的任何政策，都必須急切把握「中國」的現實。他在競選總統時，曾經對美國作家懷特（Theodore H. White）表示，如果他當選總統，必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嘗試與毛共接近。

同年十一月七日，美國總統選舉結果揭曉。同月十五日，美國以書面通

知毛共，建議第一三五次華沙會談再延至一九六九年二月五日或十一日舉行。這對毛共說是正中下懷，不過它還矜持著把會談日期稍加改變。十一月二十四日，「新華社」重新發表毛澤東於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該報告第八節末尾說：「我們的原則性必須是堅定的，我們也要有爲了實現原則性的一切許可的和必須的靈活性。」這暗示毛共的對美關係，將在政策上堅持原則性，而在策略上運用靈活性。二十五日，毛共駐波蘭代辦陳東通知美駐波大使，要求定期恢復會談。二十六日毛共「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談話，在宣布毛共已向美國建議於一九六九年二月二十日恢復一三五次會談之後，接着說：「到那個時候，美國的新總統已經上任一個多月了，美國大概就可以拿定主意了。」這幾句話，是深深值得玩味的。

這次會談，由於毛共駐荷蘭外交人員廖和叔投奔自由并受到美國的庇護，毛共又憤而臨時聲明中止舉行。但一九六九年三月至八月，由珍寶島到新疆的裕民縣，毛蘇武裝衝突不斷升高。且其時西方盛傳蘇聯將對毛共發動突襲，摧毀其核子基地，使毛共恐懼異常。在美國方面，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尼克森總統發表關島談話，勾畫出其新亞洲政策的輪廓，此後就單方面展開一連串對毛共示惠工作，那有如替跌落在大海中的毛共拋下一條繩索。十二月三日，美國駐波大使斯托塞爾（Walter Stoessel）與毛共代辦雷陽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初度接觸，嗣經交互往訪，終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日恢復一三五次華沙會談。

依照尼克森總統的說法，「一九七〇年秋天時，『中國』方面開始藉私人與可靠的外交途徑表示了反應。雙方均在從事於展開一種過程。一九七一年春，有一連串配合的公開與私下的步驟，而以季辛吉的七月前往北平以及我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領袖』會晤的協議，達於高潮」⑤。

據我們所知，在美國與毛共之間發生橋樑作用的，除了羅共首領齊奧塞斯庫（N. Ceausescu）之外，也還有其他的歐洲外交官在內⑥。但被毛共稱為「美國比較嚴肅的資產階級作家兼記者」的史諾（Edgar Snow）也「功」不可沒。他於一九七〇年八月起訪問毛共，在中國大陸逗留半年之久，他曾經連續寫作了若干篇爲毛共宣傳的文章，都在義大利的「時代」週刊上發表。唯有「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那一篇，却在毛共發動兵兵外交之後，才獲得

毛澤東的同意，於一九七一年四月三十日出版的美國「生活」雜誌上發表，雖然談話的時間是前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這篇文章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直接引用毛澤東的談話的方式下，報導了毛澤東的談話內容如左：

「如果蘇聯不行，那麼他（指毛）將寄望於美國人民。單是美國就有兩億多人口。生產已經高於各個國家，教育普及。他將高興與看到在那裏出現一個黨來領導革命，雖然他並不預料在最近的將來就會出現。

「他說，同時，外交部（指毛共「外交部」）正在研究讓美國人左、中、右都來訪問「中國」。是否應當讓代表剝斷資本家的尼克森這樣的右派來呢？應當歡迎他來，因為，據毛解釋說，目前「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要跟尼克森解決。毛將高興與他談，他當作旅行者也行，當作總統也行。」

這段話裏有政策、有策略，有原則性、有靈活性，有未來的目標、有當前的企圖，有對美國乃至對尼克森本人的評價，可說是相當技巧也相當坦白。但是在當時，史諾的文章引起美方的熱烈反應，包括尼克森本人在內。於是同年七月季辛吉訪問北平，為尼克森翌年往訪鋪了路。

三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總統一行經上海飛抵北平，和毛澤東及周恩來晤談。一九七三年五月，毛毛雙方互設了「聯絡辦事處」。毛毛關係是改變了，問題是其改變的程度如何？這種改變是否有其限度。

從美毛開始圖謀接近到現在，毛共報刊上時常引用的兩句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是從毛澤東「重慶談判」的故技脫胎而來。其真實的意義是，目標是筆直的，道路是迂迴的。或者說原則是堅定的，策略是靈活的。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上，刊載了尼克森總統所作「通往和平的真正道路（The Real Road to Peace）」一文。他在文中首先說明當代世界的變動程度比過去任何時期都更迅速、更劇烈。然後接著說：「一項明智的對外政策，不應只能跟上這種變動，而是應該早已料到這種變動；它不應只隨着歷史的潮流浮沉，而是必須盡力把歷史的潮流導向我們這個國家所信仰的各項偉大目標。」他更具體地說明：「美國

對外政策在過去的三年半期間，歷經了徹底和影響深遠的改革——但是這些改革仍然保存一項基本的一貫原則。我們始終保持美國的既定目標的基本意識，但另循其他途徑，以配合一個不斷轉變的世界中經常變化的環境，來追求我們的目標。」

說穿來，美毛方面都是目標不變，手法在變。

美國的目標是維護自由主義，或許它目前沒有決心撲滅共產主義，而只願使「自由世界和共產強國終止永遠的對抗」（它是否希望在競爭中擊敗敵方，它不會有明白表示）。具體點兒說，它要以實力為基礎，構築一項國際多元新均勢，強迫蘇聯進入以美國為中心的和平架構之中。老實說來，所謂共產強國是指蘇聯，只有蘇聯才是美國的對手，在美國心目中，毛共只在牽制蘇聯方有點作用（當然，美國最不願見蘇聯控制中國大陸），最多還希望毛共在結束越戰方面有所幫助。此外，美國對毛共即無所求。

毛共的目標是推行共產主義，它埋葬資本主義的日程即或有所變更，但絕不會放棄。它的手法是，與美國又聯合又鬥爭；聯合美國鬥爭蘇聯；防止美蘇聯合，挑撥美蘇鬥爭；聯合第三世界，鬥爭美蘇兩個超級大國。

美毛在牽制蘇聯的意圖上是相同的。但這件事的本身就有一種自然的限制。如果美、毛、蘇之間是一種三角關係，那麼北平和華盛頓的距離近了些，它們和莫斯科的距離就要遠一些。美國想要維持的是國際均勢，它不願見莫斯科壓倒北平，它也不會幫助北平壓倒莫斯科。蘇聯當然不願見美毛過度接近，當美毛要互設辦事處時，蘇聯就在海上炫耀武力；毛共更就心美蘇聯合對付它，當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訪問過華盛頓後，毛共就試爆它的核子武器。以當前情勢而言，美蘇「和解」似乎比較真實些，也具體些，它們之間的若干宣言、條約、協定，總比美毛間的空泛姿態要實際一些。這是美國的願望，但却構成毛共的憂慮。

美國當初希望毛共協助結束越戰，但這問題不能完全由毛共決定，莫斯科尤其是河內的態度才是決定性的。美國是一方面利用毛蘇的矛盾，一方面使用自己的實力，來解決此一問題。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起，美國對南北越和寮國邊界地區大規模轟炸，之後尼克森才前往北平訪問；同年四月六日美機正式開始轟炸北越，五月八日美國下令在北越港口外佈雷，之後尼克森才動身訪問莫斯科。這些軍事行動既未妨害毛蘇爭與美國接近，河內也就

只好與美言和，雖然那並非是真正和平的實現，當然，北平和莫斯科都不會違背共產主義運動的利益，也不願担負出賣朋友的罪名。

毛共和美國接近，自然含有不利於中華民國的陰謀。可是美國的對外政策，也正如尼克森所說：「維持我們在自由世界中的所有聯盟的力量、完整和堅固，是我們為促進和平與安全而採取的一切其他創始性行動所必須依賴的基礎。雖然我們致力和過去的敵人改善關係，我們決不會拋棄我們在世界各地的盟國和朋友。」（同前引文章）

尼克森訪問毛共時，雙方的「上海公報」中是各說各話，但雙方同意的事項中，有所謂：

「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在任何一方都不準備代表任何第三方進行談判，也不準備同對方達成針對其他國家的協議或諒解。」

前者是對蘇聯而發，後者就是雙方都不出賣朋友表示了。

四

在尼克森訪問大陸的「上海公報」中，毛共會重申它自己的立場說：「台灣問題是阻礙『中』美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中國政府』堅決反對任何旨在製造『一中一台』、『一個中國、兩個政府』、『兩個中國』、『台灣獨立』和鼓吹『台灣地位未定』的活動」。

但「美國方面聲明：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雖然周恩來說過只要中華民國的大使館還在華盛頓，毛共連新聞記者都不派往美國的話。可是，一九七三年「聯絡辦事處」的成立，是與上述立場不符的。毛共所以如此，其一種可能的解釋是蘇聯的威脅太大，毛共被迫進一步聯美抗蘇。不過，同年六月布里茲涅夫訪美，毛共的此一企圖就跡近幻滅。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毛共先在華盛頓踏上一隻腳，再徐圖不利於中華民國。不過，美國負責人士一再表明，其對華政策的三項原則為：（一）尊重傳統友誼；（二）維持外交關係；（三）履行條約義務。這使得毛共無機可乘，陰謀也就難以獲逞。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季辛吉第六次訪問中國大陸時所發表的聯合公報，「重申信守上海公報中確定的各項原則」。其中有一段說：

「他們特別重申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或世界的任何其他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

就字面而言，對抗蘇聯的範圍似乎是擴大了一些。

聯合公報的另一段話說：

「美國方面重申，美國認識到，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中國』方面再次表示，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只有在確認一個中國的原則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就實質而論，毛共的立場并未加強，但也沒有使得美毛關係的進一步發展更加容易。

聯合公報說：「雙方商定，應該繼續擴大聯絡處的工作範圍。」事實上雙方的「辦事處主任」，都有一陣子離開任所而遲遲不歸。

聯合公報說：「雙方研究了擴大兩國交流的問題，並商定了明年的若干新交流項目。」事實上最近數月來，訪毛的美國人士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五，同時自去年十二月以來，美國沒有一個著名人士前往中國大陸。連預定三月訪毛的紐約州立大學代表團，也被毛共通知延期。同時，最近訪問美國的毛共人員也極少⑦。

聯合公報說，雙方要採取措施「為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貿易創造條件」。事實上，正如蘇聯廣播所說，根據美國商業部的資料，一九七三年美國與毛共的貿易額是七億五、三六〇萬美元；而同一時期美國與中華民國的貿易額，則達到二九億四、一〇〇萬美元，這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換句話說，美國和中華民國的貿易額，比和毛共的貿易額要多三倍⑧。

蘇聯廣播還提到美國一再實行支持中華民國的方針，國務卿季辛吉於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第二十八屆聯大會議上講話時，十分明確地聲明，我們永遠不會拋棄自己的同盟者和朋友，加強我們的傳統友誼，是發展我們以後對敵人新攻擊的重要基礎⑨。

的確，由於中華民國的堅強、安定與繁榮，中美的經濟貿易關係不斷加強。今年三月一日，美國務院發布題為「有效中的各條約」的官方文件，副題為「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仍屬有效之美國與他國所訂條約及其他國際協定一覽表」。其中與中華民國簽訂現仍有效的，包括廢除治外法權、租借法案及共同防衛條約等二十五項。此外，馬康衛大使退休，華盛頓迅即提名資深職業外交官恩格(Leonard Unger)繼任駐華大使，都可為美國所宣示之當前政策的佐證，也象徵着中美友誼的堅強。至於蘇聯在同一廣播中所說，由於毛共反蘇，失去了社會主義國家的支持，才使得美國有信心對它不必客氣，而毛共則被迫處於尷尬的無助的地位。那自然是蘇聯對毛共的心戰手法，但也反映出毛共聯美的一切陰謀，難免要落空。

儘管周恩來一再表示，目前毛共的批林批孔運動，不影響其對外政策。但外交是內政的延長，大陸正在抨擊西方音樂，禍延貝多芬、舒伯特、史特勞斯及巴哈；安東尼奧尼的「中國」紀錄片，法國的「中國人在巴黎」喜劇片，相繼受到攻擊和抗議；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變成了「反動的歷史學家」和「國際間諜」；甚至「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也受到抨擊。在此情形下，從周恩來以下的共幹，不得不對外人收起笑臉，以免成為日後被整肅的口實。這能不影響到毛共的對外活動嗎？

就西方傳統觀點看來，人們會認為毛共內部動盪不安，政策搖擺不定，激進派和溫和派的勝負未分，對它暫存觀望較為妥帖。形勢如此，倘使說美毛關係會有一個冷淡時間，是容易使人相信的。

五

前引尼克森「通往和平的真正道路」一文裏，提到「共產陣營領袖」的「某種改變」時說：「這是一項極為重要的政策轉變；但是，重要的一點是要認清這祇是改頭換面，而非同心轉意。這是一種肯定舊時所用戰術不能成功的一項合理而適當的估計。」更為具體的話是說：「蘇聯和中共都并未放棄它們各自對世界的看法。」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季辛吉在華盛頓「全球和平大會」上演說稱：「在一個意識形態分立的時代中，敵友之分是客觀的現實。我們和我們的友人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利益，而且我們知道，我們友誼結合的力量對於減少敵我之間的緊張，是極為重要的因素。」

美國最近的政策，似乎是把現實利害置於意識形態的分歧之上。然而，說它敵友不分，也未免有些過分。美毛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是無法一致的，它們的接近只有在利害關係方面去找尋其依據，而這種依據又是如何脆弱啊！

美毛接近，在牽制蘇聯和結束越戰方面，總算不圓滿地多少發生了一些作用。今後美國的重要課題，是謀致中東和平及加強它與歐洲盟邦的關係。這兩項工作都非常艱鉅，毛共不僅幫不上忙，它還在那些地區鼓動反對兩個超級大國，和美國唱對台戲。如果我們把目光放得遠一些，就會發覺今後美毛的對外政策，不會是由兩端向中央點接近，不會是由同一端平行向前，而會是背道而馳，更正確地說會是「針鋒相對」。

毛共與美蘇又聯合又鬥爭，同時聯合第三世界鬥爭美蘇，其間本來就充滿着矛盾。季辛吉第六次訪毛時，毛共派其「外交部」部長助理王海容到巴基斯坦去歡迎，再陪同季氏飛往北平，那種趣劇是不能常常上演的，否則第三世界就會遠離開它。以目前毛共的內外動向而言，聯美沒有太多好戲可唱了，毛共將把重心放在聯合第三世界方面，它要在那裏鼓動反帝、反殖、反超大、反霸權的鬥爭，而鬥爭的主題是保護民族資源，那包括外資企業國有化、拒絕外資開發國內資源、若干涸領海、貿易、海運等等。在毛共批林批孔運動中，拒絕了西方代表團往訪，却把尚比亞總統卡翁達、阿爾及利亞主席包米迪尼和坦桑尼亞總統尼雷爾邀請到大陸。坦、尚兩總統被邀，與預計提前兩年完成的毛共援建的坦尚鐵路有關。而包米迪尼被邀，則無疑是由於他在第三世界日趨重要的地位和他在貿易與資源鬥爭方面態度的強硬使然。這些也正顯示毛共今後對外鬥爭的興趣與方向。

毛共「紅旗」雜誌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署名常謙的「在所謂『能源危機』的背後」一文中，肯定地說：「資本主義世界的『能源危機』，從本質上看，是資本主義制度危機的反映，是資本帝國主義制度各種矛盾激化的產物，是壟斷資本對國內外人民殘酷剝削和瘋狂掠奪造成的，在當前，又是美帝和蘇修兩個超級大國瘋狂對外擴張和爭霸世界的直接結果。」又說：「『能源危機』是當前天下大亂的一種表現。它又必然會使世界形勢繼續朝著動亂的方向變化。」看來，毛共不會放過這個乘資本主義制度之「危」，以反帝反殖反超大反霸權製造「天下大亂」的良機。

季辛吉分階段解決石油危機的計劃，最後一個階段是由消費國和產油國進行協商。這個計劃進行得本不十分順利，而毛共能夠給予美國的，是阻力而不是助力。

由於毛共在第三世界的活動，無疑已使蘇聯加緊了在這方面的努力。至於美國，它本有解決世界貧窮問題的抱負，如果其他重大問題能順次解決，它會把注意轉向第三世界。一九七四會計年度，它已通過五五億美元的援外法案，那是韓戰結束以來最高的一次。季辛吉的訪問拉丁美洲，自然也與改善對第三世界的關係有關。今後的第三世界，將會有著「三角鬥爭」，但將沒有美毛聯合對付蘇聯，而只會毛共鼓動反對兩個超大的態勢。

倘使美毛雙方的內外情勢，沒有特殊的重大變化，則它們之間，將是對立多於聯合，衝突多於一致！因為，如果撇開策略而談實質，美毛之間才更是「在當代一切根本問題上針鋒相對，有互相分開的東西，沒有聯合起來的東西，有對立的東西，沒有共同的東西」。時間愈久，策略上的暫時接近，就愈不能掩蓋實質上的分歧了。

註①毛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同年六月三十日毛澤東發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時，就宣布了「一邊倒」。

註②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人民日報」刊載：「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即一評）一文中，說明這些內容是由於毛共代表團堅持，才加入一九五七年國際共黨莫斯科會議「宣言」中的。

註③國內有郭榮趙教授節譯本，一九七一年中國研究中心出版社印行。

註④同右節譯本，一一頁。

註⑤一九七二年二月九日尼克森總統的外交咨文。依據同年二月十日中央日報譯文。

註⑥據史諾在「同毛澤東的一次交談」中透露，其中包括一位歐洲國家駐北平「使團團長」。

註⑦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時事社華盛頓電」。見三日星島日報第三版。

註⑧同月十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評論：「關於中國領導就台灣問題採取的無原則立場」。

註⑨同右。

談美毛關係

——上接第66頁——

因為自前總統貝當古起，「民主行動黨」從來即不主張「石油國有化」，並且至今委內瑞拉的經濟仍舊完全依靠石油之際，很難在已預定的一九八三年以前達成「石油國有化」的目的。

無論如何，在委國石油政策演變之中，已對其外交政策產生重要影響。委內瑞拉加強與阿拉伯石油輸出組織國家的團結，加入南美洲安第斯（Andes）山脈集團等，都與石油問題有關。新當選的裴瑞斯總統已聲明他將維護「民主行動黨」的精神，並繼續凱蒂拉總統的對外政策，尤其是不主張破壞與美國之友好關係，因而「民主行動黨」執政和以往「基督教社會黨」的政策，將不會有多大差異。問題是在裴瑞斯的談話中，已顯示其反共立場雖不會改變，但在外交方面他將採取彈性，而要改善與古巴或其他共黨國家之關係。

註① Dec. 20, 1973, *Economiste*.

Dec. 20, 1973, *Le mond.*

註② Dec. 14, 1973, *Le monde*.

Dec. 18, 1973, *Le monde*. "Le Parti d'action démocratique aura la majorité absolue dans le prochain parlement."

註③ Dec. 20, 1973, *Economiste*.

卡拉加斯十二月卅一日合衆國際社電。

註④「石油與政治」一書是於一九五六年在墨西哥出版，為討論國有化問題對拉丁美洲最具影響的一本著作。

註⑤ July 1973, *Le monde diplomatique*, "Le gouvernement met en oeuvre une politique de nationalisation des gisements par étapes".

註⑥ 4.5 Bolivares (索幣) = U.S. \$ 1.00

委國通貨膨脹率一九七一年祇有一%，一九七二年為三·五%。在拉丁美洲國家中是通貨膨脹率最低的國家。